

ISSN 1997-3721

師大台灣史學報 No. 9

2016年12月31日出刊

BULLETIN OF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NTNU

TAIWAN

石暘睢 (1898-1964) 文史調查事業之初探——兼論戰後初期的臺灣博物館

謝仕淵

《師大台灣史學報》
第9期 頁139-170
2016年12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石暘睢（1898-1964）文史調查事業之初探 ——兼論戰後初期的臺灣博物館*

謝仕淵**

摘 要

1930年「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中的史料展覽會，1930年代「臺南市史料館」、「臺南市歷史館」以及延續至戰後的「臺南市立歷史館」均與石暘睢有關。被同好稱為「活字典」的石暘睢之調查事業，或受惠於在臺日人如村上玉吉等的啟發，因此他開始在都市計畫如火如荼開展的臺南市，進行石碑調查，將之保存在今赤崁樓與大南門外等地，並於物件調查時，保留了不同歷史層理中的空間訊息，給予追索從當代回溯日治、清領等階段，地方歷史變遷的重要線索。在皇民化運動的脈絡下，他對肖像、匾聯、神像等進行廣泛的調查，留下重要的文化資產。而其在挖掘李茂春墓與洪夫人墓的工作，也說明了他的文史調查活動，已非純粹的文人雅士之文藝活動，而是具有歷史考古之企圖。石氏的調查活動及其成果，往往也透過博物館或者展覽的型態與社會溝通。戰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者提供的寶貴意見，本文內容或者已依意見修改，或者仍待進一步的思考，透過另文回應。當然，本文文責由筆者負責。同時，感謝石暘睢先生的公子石允忠先生、已故的黃天橫阿伯及其公子黃隆正先生慨然提供資料，得以補充重要的一手資料。並對論文寫作過程中，張瑜庭小姐的協助，表達謝意。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組研究員

後，他所推動的被稱為歷史文物展等活動，企圖構建以臺南為主的地方歷史想像，然而，它的在地化途徑，使其所經歷的風景，並非故國河山的視野，恰好也是這條路，保留著我們追尋臺灣博物館發展歷程另一種可能——在殖民現代性與大中國史觀之外。

關鍵詞：博物館史、蒐藏、臺南、文化資產

一、前言

1933年11月12日，臺南永康洲仔尾附近的一塊田地上，距離「地下約六尺深挖掘一石馬，高四尺長六尺重量千五百斤，誠為貴重史料也」，這批出土時腳已斷的石馬，為清朝乾隆時代協助平定林爽文事件有功的鄭其仁之墓前石馬。石馬出土係因臺南一中學生小林悅郎在暑假作業中提及此墓地，因此吸引臺南一中前嶋信次與鹽塚勝之等兩位老師，以及臺南州臺南市史料館的野田八平和石暘睢前來挖掘。挖掘出的石馬，得到地主唐金祿的同意後，寄贈於位在安平の臺南市史料館。¹

當日參與挖掘者，除了前嶋信次與鹽塚勝之外，最特別的是，時年35歲，一生都投身於文史調查活動的石暘睢。石暘睢在1930年的「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中，被史料展覽係係長村上玉吉聘為委員，其時致力史蹟、史料之搜羅，發現明墓及被埋沒之石碑多件，提供了自我收藏與調查之所得供展出。石暘睢經此表現後，深得村上玉吉賞識，請其到以「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的史料展覽為基礎而成立的臺南市史料館幫忙。² 因此，當石暘睢參與挖掘鄭其仁墓前石馬時，身份為史料館的臨時職員。

1937年，臺南州臺南市歷史館成立，石暘睢被舉為雇員，為正式之職員。此後一直任職於臺南市歷史館。戰後，石暘睢正式的職務為臺南市文獻委員會委員，兼採訪組組長，負責管理臺南市歷史館，在這段時間，石暘睢跟同好開啟了另一波長達十餘年的調查活動，累積了比之日治時期兩倍以上的文物。³ 並將調查的觸角，走出府城及其週邊，與戰後臺南縣的同好們，如吳新榮，開啟了更為廣泛的調查。

事實上，石暘睢的文史調查活動並非單打獨鬥，他有一群同好夥伴，包括

¹ 〈夜夜荒損田烟之目前大石馬與被部落民盜去之銀首級〉，《臺南新報》，1933年11月15日，8版。

² 莊松林，〈懷念石暘睢先生〉，《南瀛文獻》10（1965年6月），頁42。

³ 未著撰者，〈序〉，《臺南文化》7:4（1963年9月），頁1。

江家錦、莊松林、盧嘉興、賴建銘、連景初、吳新榮、黃天橫、謝碧連等人，石暘睢年齡長於多數同好，甚至被少其十餘歲的盧嘉興，稱為「文獻導師」，並且被同輩中人稱為「活字典」。本文所述之文史調查活動，石暘睢在其中的形影並不孤單，他的文史調查活動展現的是這群文史工作者的集體成果。

對照於同時代，臺南的石暘睢及其同伴所做之事並非孤例，將文史調查成果訴諸於展覽的型態問世，臺南也並非首創。以士林為例，已故的曹永和院士，在其年輕時曾參與由士林地區年輕知識份子所組織的士林協志會。協志會對地方文化的提升和啟蒙都有使命感，所以曾經在 1941 年 8 月 23 日到 25 日之間舉辦「士林文化展」（在此展覽的基礎上，該年 12 月的《民俗臺灣》甚至出版了「士林專輯」）。⁴ 另外，在板橋則有板橋鄉土館，展出主題分別為海山郡物產與工藝、板橋林家相關資料，以及定位為參考資料的書畫陶瓷玉器等。⁵ 換言之，石暘睢及其同道中人的文史調查與展覽事業，應是同時代的其中一例，這些成就也不脫離以民俗學、鄉土史研究為職志的《民俗臺灣》之脈絡，石暘睢及其同道的許多作品，因此都曾在《民俗臺灣》中發表。

至於本文之以石暘睢為代表，則因他的文史調查事業貫穿了戰前戰後，且相較於他人，石暘睢專職於戰前戰後的臺南市歷史館，所經手之材料除了文獻亦有更多的文物，調查之結果除著述成文，更關注透過展覽的形式與社會溝通，故而以石暘睢為代表，藉由考察他及夥伴們所開展的文史調查活動，並嘗試將這些成果，放在臺灣博物館史的脈絡下理解。

嘗試回答上述的問題，主要根據的材料，除了石暘睢的著作之外，主要為他參與或者主編的展覽之文物專輯，從這個面向來說，以「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史料展覽為基礎的《臺灣史料集成》，蒐羅諸多收藏家典藏的《臺南文化》4 卷 2 期（1954.11）「文物專刊」，以及同刊以歷史館之典藏為主的 4 卷 4

⁴ 鍾淑敏、詹素娟、張隆志訪談，《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10），頁 51-54。

⁵ 《板橋鄉土館出品目錄》，出版項不詳。

期 (1955.6) 「歷史館專號」為重要材料，其次如朱鋒 (莊松林) 在《臺北文物》6 卷 2—4 期 (1957.10、1958.3、1958.6)，連續刊載的〈臺南近十年來的考古工作概要〉，則反映了石暘睢及其同好的調查成果。最後，1965 年出版的《南瀛文獻》第 10 期，因石暘睢過世出版的紀念專輯，匯集諸多學友的過往回憶，足以提供研究者串連其人際網絡的重要材料。⁶

這些豐富的資料，刻劃石暘睢等文史研究者從戰前到戰後初期，二十餘年的發展進程，然而，這些研究者的成果及其討論，多數被放在民俗學與臺灣史研究中理解，但卻很少被放在臺灣博物館史中定位。實際上，石暘睢調查的文物及他服務的博物館，現在依舊存在——1960 年代之後曾稱為臺南市民族文物館，⁷ 現則為鄭成功文物館。

一般來說，近百年來臺灣博物館發展歷史的討論，關注的核心課題，多半以國家機器如何透過博物館貫徹其文化政策為討論重點。例如，對於日治時期博物館發展的典型論述，可以臺灣博物館代表的殖民現代性為主。⁸ 李威宜則以戰後的國立歷史博物館與故宮博物院為例，說明戰後臺灣博物館的去日本化與中國化的軌跡。⁹ 在此階段，李威宜也提出地方博物館的發展，例如本文討論的臺南市歷史館 1960 年代改為臺南市民族文物館，在其展示中，開始將多元的地方歷史，化約為強調歷史起源於中國的詮釋，關注民族英雄的造神運動。¹⁰ 這些討論的問題意識，關注了不同類型的博物館與國族想像間的關係，給予了解戰後臺灣博物館發展的重要提示。然則本文則想以戰後初期的收藏調查者為主體，討論這批主導戰後二、三十年臺灣地方文史調查的人，其中的收藏研究重點與對象為何？是基於何種觀念、在什麼樣的背景下開展？對於

⁶ 紀念專輯共收錄中外學者、文史調查同好所著二十餘篇文章。

⁷ 黃天橫，〈「臺南市民族文物館」簡介〉，《臺南文化》新 4 (1977 年 11 月)，頁 134。

⁸ 可參見陳其南，《臺博物語臺博館早期臺灣殖民現代性記憶》，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2010。

⁹ 李威宜，〈去殖民與冷戰初期臺灣博物館建制的國族想像(1945-1971)〉，收於王嵩山主編，《博物館、知識建構與現代性》(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2005)，頁 367-390。

¹⁰ 李威宜，〈博物館想像的社會史研究：1960-1980 臺灣小型博物館製作者與展示物的視覺想像與歷史敘事〉，收於王嵩山主編，《製作博物館》(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2009)，頁 59-96。

這些收藏於展示上如何處理？本文試圖以石暘睢的文史調查活動與博物館事業為例，試圖釐清上述問題，藉以說明戰後初期臺灣博物館發展的狀況。

二、文史調查事業的開展

1898 年出生的石暘睢，為清代府城臺南殷商石鼎美之後人，先祖石時榮於清嘉慶時來臺，家族中先人石耀宗曾中舉。¹¹ 1907 年入學臺南廳臺南第二公學校（今立人國小），1913 年畢業後，繼續就讀高等科，學習實業科商業課程。1915 年學成後，承母命與曾烏李女士結婚。1921 年，曾夫人卒，1923 年再娶陳富治女士。這段時間，莊松林指出：

當石先生十八歲畢業臺南第二公學校實業商科時，本應升學進修（當時本省只有國語（師範）學校和醫學校），然直萱堂葉太夫人愛子心切，不肯給他遊學他鄉，也不願給他到社會服務。所以他 22 年時間在家自修改讀文史與藝術，收集了許多書畫、金石、陶瓷、舊文獻、新史料等潛心研究，也時常利用閒餘，到市郊區訪勝探古，做了田野工作。¹²

林鶴亭也指出石暘睢「師事邱及梯研習國文有年，學業大進，博通祖國文史，尤其對鄉土史乘興趣橫生。進而治臺灣史，蒐集文物，從事考證，保存史料。因其學有成就，熟識掌故」。¹³ 根據資料來看，石暘睢的收藏被進一步的於展覽中展出，應是「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史料展覽會。

1930 年，「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史料展覽會的舉行，石暘睢被史料展覽係係長村上玉吉聘為係委員。因此，《臺灣史料集成》序言中舉出史料展覽

¹¹ 石暘睢家族歷史可參見，石暘睢，〈先高祖芝圃公行跡〉，《臺南文化》3: 4（1954 年 4 月），頁 38-39。

¹² 莊松林，〈懷念石暘睢先生〉，《南瀛文獻》10（1965 年 6 月），頁 41。

¹³ 林鶴亭，〈石暘睢先生事蹟〉，《南瀛文獻》10（1965 年 6 月），頁 35。

的特徵時稱「在此機會悉力找尋未發現的史蹟與史料，幸得到意外的收穫，如找出皇明墳墓、素被閑卻的碑碣、欲得而不可得的史料，均能得到，作為偶然的參考品，實屬可喜。」對此，莊松林認為應歸功於石暘睢的熱心與努力。¹⁴ 該項展覽物件分為「書冊、文書、地圖、書、畫、拓本、寫真、陶瓷器與玻璃、器物與雜部等十項，觀察來源多為公私收藏之集結。

從石暘睢出品的文物中，可見對文史資料的喜好來自年少，1961 年，時年六十餘歲的石暘睢指出對於古錢的收藏興趣「歷今已達四十餘年」，因此在以「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史料展覽會為基礎編輯的《臺灣史料集成》一書中，石暘睢出品甚多（如表一），其中古錢尤其完整。¹⁵ 其次，有些文物應為家中之收藏，例如已由石暘睢之子石允忠捐贈給臺史博的鄉試錄，為家中先祖石耀宗考試應舉 1843 年癸卯科福建省鄉試的登科舉人名錄。

表一 《臺灣史料集成》石暘睢出品文物表

分類	項目名稱	分類	項目名稱
書冊	北白川宮	器物	古扇
	臺灣開創鄭成功	雜部	梅干樽
	鄭君墓誌銘		罌紙木板
	臺灣外記		明末古錢 天啟通寶、崇禎通寶、弘光通寶、 大順通寶、利用通寶、昭武通寶、 洪化通寶、裕民通寶
	六亭文集		明永曆通寶 一分、楷書、行書等共 3 枚
	澎湖廳誌		光緒元寶
	鄉試錄		荷蘭銅貨幣 1880-1884 年、1912-1917 年、1898- 1906 年、1916-1922 年等發行共四枚
	御纂春秋		荷蘭殖民地用銅貨幣

¹⁴ 莊松林，〈懷念石暘睢先生〉，頁 42。

¹⁵ 石暘睢，〈南明錢錄〉，《臺灣風物》11: 4 (1961 年 4 月)，頁 46。

		1858年、1855年、1920年發行共三枚
		臺南官銀票
文書	光緒年間の關稅書類	
	土地に關する古文書	
	賣契字	
	海東書院童生試卷	
	安平縣童生試卷	
	蓬壺書院童生試卷	
	崇文書院童生試卷	

資料出處：整理自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臺灣史料集成》，臺南：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1931年。

石暘睢經此表現後，深得村上玉吉賞識，因此請其到以「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史料展覽為基礎，而成立的臺南市史料館幫忙。¹⁶ 到了1935年臺灣總督府舉辦臺灣博覽會，於臺南市設立「臺灣歷史館」。村上玉吉又聘石暘睢等為委員，協力新史料採集與第三會場碑林的建設，並提供文書、器物、書籍與地圖等收藏供展覽（表二）。

觀諸1930年代兩次重要的展覽活動，除可藉此了解石暘睢收藏的物件，更可從中理解從收藏物乃至展示活動，其間之臺灣知識與文化政治的關聯。例如，石暘睢提供許多清代的契約供展示，但文書部其他藏品，還包括了日治初期的國勢調查告示、土地調查告示、土地登錄謄本等物件。¹⁷ 清代各項臺灣民間慣習物件的出現，是日治初期進行的舊慣調查的結果，舊慣調查一方面是日治時期臺灣特殊法制形成的基礎，一方面說明日治初期臺灣知識生產與殖民統治的關係。¹⁸ 同上的展示物件，又說明了臺灣博覽會中，透過從清代到日治時期物件的展示，呈現了線性的、進步的演化展示，從中指出日本對殖民地臺

¹⁶ 莊松林，〈懷念石暘睢先生〉，頁42。〈臺南史料館開館 附寄不少內容漸充〉，《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6月19日，5版。

¹⁷ 《臺灣歷史館出品目錄》，14-24頁。

¹⁸ 張隆志，〈從「舊慣」到「民俗」日本近代知識生產與殖民地臺灣的文化政治〉，《臺灣文學研究集刊》2（2006年11月），頁35-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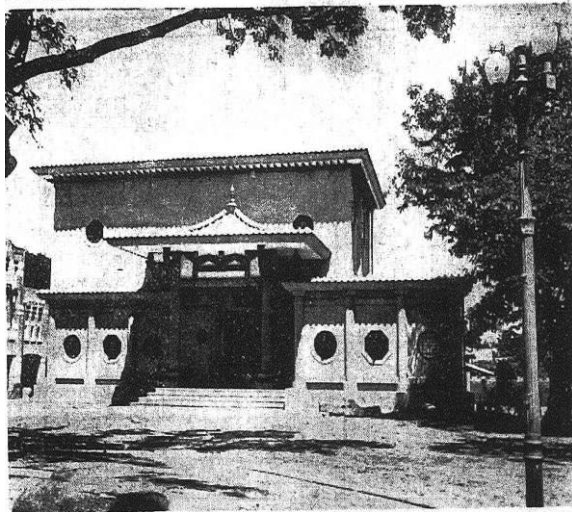
灣的治理有其成效，進而正當化了日本對於臺灣的統治。¹⁹ 另外，尚有一問題或值得繼續討論，亦即這些被視為舊慣調查的文書，因其歷史價值的被重視，與其成為歷史「物件」之被收藏，兩者之間的關係，應是了解臺灣古文書收藏史的重要問題。

表二 臺灣博覽會之臺灣歷史館石暘睢出品文物表

分類	項目名稱	分類	項目名稱
文書之部	咸豐二年公文書（狀袋）	書籍之部	臺南縣治要覽
	鳳山縣執照		臺南事情
	臺灣縣業戶執照		海東書院童生試卷
	鳳山縣信票		崇文書院童生試卷
	臺灣府行鹽執照		東南記事
	嘉義縣納戶執照（港餉）		臺灣採訪冊
	嘉義縣納戶執照（車餉）		張丙案內奏稿
	鳳山縣納戶執照（糖餉）		新增銀論
	臺灣縣糧戶執照（厝餉）		臺省民主歌
	封收林案叛產租執照		臺灣開創鄭成功
	臺澎兵備道執照		明清軍談
	臺南官銀票（三枚一組）		北白川宮
	臺南官錢票		蓬壺書院童生試卷
器物之部	清國時代兵勇竹甲帽	安平縣文童生試卷	
	咸豐二年公文書狀袋	旗後洋藥分局釐金清冊	
	英國領事館關防官印	鹿港洋藥分局月結總冊	
	安平英國領事館內洋磚	諭鳳屬販戶文	
	大阪洋行野紙版（木板）	地圖之部	
			臺南縣管內全圖

資料出處：整理自《臺灣歷史館出品目錄》，出版項不詳。

¹⁹ 相關討論可參考黃琪惠，〈再現與改造歷史—1935年博覽會中的「台灣歷史畫」〉，《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0（2006年3月），頁109-149。劉宜旻，〈史料與歷史文化的新展示—1930年台灣文化三百年祭史料展覽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圖一 1937年落成的臺南市歷史館

資料出處：〈新裝成れる臺南歷史館〉，《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8月29日，5版。

展覽結束後有感於資料豐富已非位在安平之臺南市史料館（安平七七九番地原稅關俱樂部）可容納，因此決議興建新館。²⁰ 1937年，新建的博物館完成，名稱由「臺南市史料館」改為「臺南市立臺南市歷史館」，並從安平遷入新館址（今民生綠園旁，成立時地址為清水町一丁目二十九番地）。²¹ 從籌設到完成臺南市歷史館期間，石暘睢參與了文物調查與收藏工作，以古碑為例，共調查了兩百多座古碑，並於大南門外設置「臺南市古碑陳列場」，共收45碑，赤崁樓設置第二碑林，至今尚存。²² 其餘未能收入兩碑林之碑，也收錄於〈臺南古碑記〉之中。²³ 而在1937年開館時，收藏概況為書畫43項、文書68項、書籍79項、地圖11項、拓本171項、寫真239項、古錢56項、匾額42項、器物232項、石碑5項。²⁴

²⁰ 〈臺南市臺灣史料 筹建臺灣歷史館〉，《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12月3日，12版。

²¹ 臺南市歷史館，《臺南市歷史館案內》，出版項不詳。莊松林，〈懷念石暘睢先生〉，頁42。

²² 臺南市歷史館，《臺南市古碑陳列場案內》，出版項不詳。

²³ 石暘睢，〈臺南古碑記〉，《民俗臺灣》2:3（1942年3月），頁46-52。

²⁴ 臺南市歷史館，《臺南市歷史館案內》，出版項不詳。

石暘睢於臺南市歷史館任職時，從表三可觀察歷史館職員雖有三、五位，但多數為兼任，因此根據總督府職員錄以及石暘睢的同好對他在歷史館工作的回憶，史料館與歷史館的運作應主要由石暘睢負責。黃天橫指出「該史料館當時不設館長，由係員日人野田八平和臨時僱員石暘睢掌管實務。經年餘聘剛畢業大學歷史系的齋藤悌吉任館長。」²⁵ 而齋藤兩年後便去職。而其餘職員，應該以掛名居多，以 1939 年為例，黃介騫的本職是臺南市役所的地方理事官，歷史館應為兼職掛名。而主事富島俊嶺本職應為臺南市役所教育課視學。大概僅有囑託當房嘉吉，算是專職於歷史館工作。但其實通貫日治時期，始終持續於歷史館工作者，確僅有石暘睢一人。

表三 臺南州臺南市歷史館職員表

年度	官職	姓名	年度	官職	姓名
1937		丸木末次郎	1940		津田健治
	主事	菊地鎮雄			富島俊嶺
	囑託	齋藤悌亮		囑託	當房嘉吉
	雇員	石暘睢		雇員	石暘睢
1938		富島俊嶺	1941	雇員	磯文子
	主事	齋藤悌亮			中澤佳郎
	雇員	石暘睢		主事	石垣當次
	雇員	磯文子		囑託	當房嘉吉
		黃介騫		雇員	石暘睢
1939	主事	富島俊嶺	1942		中澤佳郎
	囑託	當房嘉吉		主事	石垣當次
	雇員	石暘睢		雇員	石暘睢
		黃介騫	1944	雇員	石暘睢

資料出處：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資料庫。

1940 年以降，受到局勢日漸緊張的影響，臺南市歷史館暫停開放，此時就連石暘睢的家人與家中所藏文物也疏開到了城郊。1944 年，臺南市長羽鳥又男本想利用重修後的赤崁樓，將該館部分文物移藏至赤崁樓，但在重新開館

²⁵ 黃天橫，〈「臺南市民族文物館」簡介〉，頁 134。

前夕，1945年3月1日的大空襲，使得藏在歷史館的收藏全被炸毀，儲存於赤崁樓與蓬壺書院的文物雖倖免於難，但歷史館重新開幕的計畫因此成為泡影。²⁶

1946年5月1日「臺南市立歷史館」在赤崁樓重新整理開幕，由石暘睢負責管理，以文昌閣展出史前、荷據、明鄭時代史料，海神廟陳列清代各種史料。其子石允忠回憶這段時間，為了保護文物他與石暘睢曾有一年多的時間，睡在赤崁樓旁的大土殿。²⁷ 石暘睢此後一直在臺南市歷史館服務，直至1961年退休，那一年，臺南市政府重修延平郡王祠，利用祠內東南邊空地新蓋一座二層樓房，將赤崁樓的歷史館文物搬到這座新館，名稱改為「臺南市民族文物館」。而在退休兩年後，1964年3月石暘睢因病過世。²⁸ 在此階段，戰後開始的調查收藏，在《臺南文化》的歷史館專號中，稱其成果「已超過日據時代所有的成績。」²⁹

綜觀石暘睢一生的調查事業，可與著作相互對照，經由附錄一可得知。他的著作中，也可見廣泛的民俗風土之採訪成果，例如宗教祭祀、市街志、歌謠、禮樂器考、石敢當等，主要發表於《民俗臺灣》、《臺南文化》等刊物。

其著作發表的時間，約當從《民俗臺灣》發行後的1941年開始，由此也可看到經歷整個1930年代博物館調查工作的石暘睢，從1930年代初期，以古錢的興趣與家藏文物為主的收藏者，變成調查因都市變遷、皇民化政策影響而有散失之虞的古碑與古墓等文物的博物館工作者。

另外，臺南縣市古碑調查則為其畢生重要成就，原本終戰前，石暘睢的調查成果，僅限臺南市及市郊的範圍，與莊松林何合作的調查成果，共有208座，成果可見〈臺南古碑記〉（《民俗臺灣》，2卷3號，之後還有補遺），而在戰後

²⁶ 黃天橫，〈「臺南市民族文物館」簡介〉，頁135。

²⁷ 石允忠口述，謝仕淵訪談，訪談時間：2012年10月24日。

²⁸ 黃天橫，〈「臺南市民族文物館」簡介〉，頁135-136。

²⁹ 未著撰者，〈編後記〉，《臺南文化》4:4，頁116。

持續的調查中，補足了戰前工作時間有限、經濟不充裕僅能記其碑名年代等訊息的缺憾，全面抄錄與拓印，並新增了 21 件的發現。³⁰ 同時，石暘睢的足跡也明顯跨出府城及其周邊，1954 年之後，因為臺南縣文獻委員會聘其為顧問，因此開始與吳新榮等密切合作，展開臺南縣古碑的調查，完成了《臺南縣古碑誌》的重要著作。³¹ 同時，也可觀察他跟莊松林從日治末期開始進行的匾聯調查，也約當在 1954 年左右，有了許多成果，發表為〈大天后宮的匾聯〉、〈臺南市中東南三區匾聯〉等文章。再者，古墓的挖掘行動及其研究也反映在其著作中，〈臺南郊外塚地考〉非常完整的調查南門、北門、東門等城門外的塚地，與此相對應的則是他跟莊松林等人開始進行明墓的調查行動，到了戰後的著作〈臺灣明墓考〉，則是田野調查與文獻引證的考證後的結果。最後，包括〈臺灣道署考〉、〈明鄭營盤考〉、〈臺灣明墓考〉等篇文章，則可見石暘睢的研究開始綜合性的參考田野調查與史料文獻。

附帶一說，1960 年代初期起，為了鄭成功登陸鹿耳門的問題，引發顯宮派與土城派等兩派的對立，支持鄭成功由顯宮登陸者為石暘睢，同為臺南市文獻會的黃典權等人則認為是由土城一帶登陸。臺南市文獻委員會也因此而分裂成兩派。事實上，1950 年代末期，石暘睢與莊松林等由於「痛感臺南市文獻委員會喪失機能，……，石先生與我們等倡起，以大多數南市文獻委員為中心，而網羅臺南市鄉土研究學人籌組臺南市文史協會。」³² 或許因為以上的因素，石暘睢過世後，紀念特輯竟是出現在《南瀛文獻》而非《臺南文化》。

最後，必須強調，石暘睢的文史調查事業，是跟一群同好相互結盟一同行動，石暘睢一生的許多調查行動，都可視為集體性的成果，其中他與莊松林的關係更是密切，莊松林跟石暘睢認識是在 1929 年 6 月間，那年莊松林畢業於

³⁰ 朱鋒（莊松林），〈臺南近十年來的考古工作概要〉，《臺北文物》6:2（1957 年 10 月），頁 91-92。

³¹ 石暘睢參與南縣古碑調查的始末或許可見吳新榮，〈跋〉，《南瀛文獻》10（1965 年 6 月），頁 57-58。以及蔡和泉，〈緬懷故友石暘睢先生〉（1965 年 6 月），《南瀛文獻》10，頁 55-56。

³² 莊松林，〈懷念石暘睢先生〉，頁 45。

廈門集美中學，由廈回臺後，經常在林占鰲經營的興文齋書局看書。莊松林說石暘睢「家道富裕，好學成性，亦時常來該書局購書，由此機緣互相認識的。」其實在興文齋聚集的同好不僅莊松林，莊松林就說他還在那裡，認識連雅堂和前嶋信次等人。³³ 到了 1936 年，趙樞馬、徐阿王、鄭廢人、張慶堂、董祐峰、黃漂舟、曹永和等組織了「臺南市藝術俱樂部」，並附設「臺灣文獻整理委員會」，在此也是同好交流採集、整理、研究等工作的地方。³⁴ 這群人是文史同好也是知音，因此形成密集往來的生活網絡。³⁵ 除此之外，石暘睢也與曾在臺南居住 8 年，擔任臺南一中教師的前嶋信次，以及任教同校的鹽塚勝之，³⁶ 另外在臺南 10 年，任教於臺南一女的國分直一和任教臺南二女的新垣宏一等人交往密切，並與任教臺北帝國大學的金關丈夫有所交誼。³⁷ 戰後則與任教於臺大的方豪、楊雲萍等時而往來。

綜上所述，石暘睢的文史調查事業，於 1930 年代進入博物館工作後，有別於前此專注於古錢，或者以私人收藏的興趣動機為主，在博物館工作之後的石暘睢，專注於較為廣泛性題材的調查，如臺南縣市的碑匾等，也開始關注過去少為人注意的墓葬文物調查，其成果並可見於具有公共性的博物館之中。直至今日，訪客在大南門外與赤崁樓碑林，或者鄭成功文物館所見之文物，大多與石暘睢有關。

³³ 莊松林，〈懷念石暘睢先生〉，頁 41。

³⁴ 莊松林，〈懷念石暘睢先生〉，頁 44。

³⁵ 廖漢臣便提起石暘睢、莊松林及其同好，晚上常聚集一起，或者泡茶或者喝酒，閒聊文史課題。廖漢臣，〈學界的墊腳石—憶石暘睢兄〉，《南瀛文獻》10（1965 年 6 月），頁 15。

³⁶ 1931 年，早在鄭其仁墓前石馬出土前，石暘睢與鹽塚、前嶋便常一起四處採訪。回憶可見石暘睢，〈穎之退耕錄〉，《臺南文化》7:3（1962 年 9 月），頁 82。

³⁷ 莊松林，〈懷念石暘睢先生〉，頁 42-44。

三、文史調查方法和蒐藏動機與觀念

(一) 皇民化運動與《民俗臺灣》脈絡下的調查

林鶴亭對石暘睢的回憶中，指出「石先生的趣向是多方面的，因其歷史知識淵博，非但對蒐羅史料保存文物，酷嗜藏書—雅俗兼備，又愛收集古錢、古瓷、古文具、古茶器甚至古文書」³⁸ 如此的描述，石暘睢似是以賞玩文物為生活品味的傳統文人。

然而，從石暘睢在日治時期於《民俗臺灣》、《科學の臺灣》、《文藝臺灣》等期刊中，發表的多篇文章，調查記錄臺南的寺廟祭祀品、孔廟禮樂器、古碑、石敢當等。這樣的行動背後，或者是出於身為歷史館職員的職責。但其面對的時代，讓這些調查行動，具有了特殊的意義。如同王嵩山指出博物館蒐藏是種價值判斷，它涉及了評價人文行動，是一種受到某種意識形態操縱的結果。³⁹ 筆者因此關心石暘睢等人的調查與蒐藏，雖可說是本於職責的工作，但進一步問，他究竟受到什麼樣的動機引導，是否意識到了某種時代的變遷，或者刻意的政策作為影響下，導致某些文化的載體—文物的消失，因此開展了收藏行動，頗令人好奇。

於局勢日趨嚴峻的 1941 年出版的《民俗臺灣》，之所以得以出刊，吳密察指出「我們可以確定《民俗臺灣》，雖然在發刊之前很謹慎地表示只是要記錄即將消失的臺灣民俗，但其實他們是對激進的皇民化政策抱持著不滿……」，《民俗臺灣》，可說是利用近衛體制重視地方文化的新文化政策，取得發刊機會，藉以記錄即將因皇民化政策而消失的臺灣民俗，⁴⁰ 因此，《民俗臺灣》必

³⁸ 林鶴亭，〈石暘睢先生事蹟〉，頁 36。

³⁹ 王嵩山，〈博物館蒐藏學探索物、秩序與意義的新思維〉，（臺北：原點出版社，2013），頁 18。

⁴⁰ 吳密察，〈《民俗臺灣》發刊的時代背景及其性質〉，收於吳密察策畫，石婉舜、柳書琴、許佩賢編，〈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狀況〉，（臺北：播種者出版社，2008），頁 56-79。

須保持著如同戴文鋒指出的曖昧性與雙重性的營造，求得刊物持續的可能。⁴¹ 張隆志則從《民俗臺灣》的出刊及其後期受大東亞民俗學影響，說明戰爭期殖民地文化政治中，《民俗臺灣》反映出的臺灣總督府、臺北帝國大學、臺灣民間知識人、以及日本內地學界構成的特殊文化政治生態。⁴²

從目前所留關於石暘睢的資料中，並無法找到石暘睢對於文史調查或蒐藏文物，更為完整的看法，但在跟石暘睢關係密切的莊松林回憶中，可約略知道，當時代開展的調查收藏行動，顯然受到皇民化運動的影響，以肖像、神像與遺牌的調查為例，在日治時期，以「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史料展覽中，所錄之對象，多半為寧靖王及五妃、鄭成功、陳永華、吳英等與鄭成功時代有關之人物，⁴³ 對於一般廣泛存在於民間信仰中的神像等，並非收藏對象。

但到了日治後期，莊松林指出與石暘睢調查廣慈庵的石碑時，發現張伊像，並陸續找到蔣元樞等像，正當準備深入普遍調查時，「不期恰逢日政府為推行皇民化，徹底強迫正廳的改善，於是佛像神位，非付之一炬，便是秘密匿藏，從此一掃廳堂，代之而起者，乃日本天照大神及小型日式神主。」⁴⁴ 然而，到了戰後初期，佛像神主遺牌重新登場正廳，1952年開始，莊松林在竹仔行街找到陳氏祖先像，石暘睢找到了忠義路翁家的翁氏祖媽像。⁴⁵ 而就遺牌方面，則因為寺廟併合、祠拆牌毀或者其他多項原因，遺牌從推測最多的兩百多件，到戰後經歷十餘年調查也僅得三十餘件。⁴⁶ 石暘睢與莊松林等人調查神像、祖先肖像、遺牌等，大致是由於日治末期的家庭正廳改正運動中，對於家

⁴¹ 戴文鋒，〈日治晚期的民俗議題與臺灣民俗學——以《民俗臺灣》為分析場域〉（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頁 43。

⁴² 張隆志，〈從「舊慣」到「民俗」日本近代知識生產與殖民地臺灣的文化政治〉，《臺灣文學研究集刊》2（2006年11月），頁 43-48。

⁴³ 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臺灣史料集成》，（臺南：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1931年），頁 42-50。

⁴⁴ 朱鋒（莊松林），〈臺南近十年來的考古工作概要（二）〉，《臺北文物》6: 3（1958年3月），頁 113。

⁴⁵ 朱鋒（莊松林），〈臺南近十年來的考古工作概要（二）〉，頁 113。

⁴⁶ 朱鋒（莊松林），〈臺南近十年來的考古工作概要（二）〉，頁 105。

庭與廟宇祭祀膜拜物造成影響，對於他們而言「也是民族文化的一大損失」，因此對此調查行動的開展與對象的選定，是為了在戰後，將在破壞行動中尚存之物加以調查了解。

莊松林回顧了從日治末期到戰後初期，他跟石暘睢進行肖像、神像與遺牌調查的脈絡，先是受到了皇民化運動的影響，不管是遭到毀損或者刻意藏匿，都讓類似的物件有滅失的危機，日治時期的行動是為了面對皇民化的影響，而戰後則為因應此影響的結果，進行更大規模的調查。當然，皇民化運動中石暘睢有時也會如同《民俗臺灣》的作者群，透過曖昧性的宣示來讓自己的行動得到正當性，如同石暘睢在《民俗臺灣》的第一篇文章〈臺南に於ける寺廟の調度品〉，便指出調查廟宇中的相關文物，是為了舊習俗的改善。⁴⁷換言之，他是用一種改善俗習而調查舊習俗的行動，得到調查的空間。是故，石暘睢在日治末期的調查行動，應該有著基於傳統文化遭遇危機而展開調查的背景。

(二) 都市開發與社會變遷下的拯救行動

除了基於皇民化運動的文化危機所產生的調查動機，他們的調查動機也跟臺南市開展都市計劃，進行遷墓、街道拓寬、或者特定物件的經濟因素而造成文物的毀損有關。以古碑為例，臺灣古碑的採集最早為 1923 年，石坂莊作開始北臺灣的碑碣調查，而在南部則始於 1930 年「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時舉辦史料展覽，展出的石碑拓本與照片共 59 件。1935 年，「始政 40 年」紀念活動中，臺南市舉辦臺南市歷史館，將事前散於南市古碑二百餘件，選擇具有重要性及富有永久保存的古碑 45 件，集中於臺南市大南門興建陳列場，莊松林並謂此舉促起臺北帝國大學採集中北部的碑碣。

然而，臺南市的「豐碑短碣，為數不少」，雖經數次展覽，仍無詳細數字，因此在 1940 年，石暘睢與莊松林開始全面踏查，但限於時間與金錢，僅以記

⁴⁷ 石暘睢，〈臺南に於ける寺廟の調度品〉，《民俗臺灣》1:1 (1941 年 7 月)，頁 26。

錄碑名、年代、立碑人等訊息，而其具體成果可見於石暘睢的〈臺南古碑記〉，此文中共記錄碑碣 208 件，莊松林說該文所載便是日治時期臺南碑碣調查狀況的梗概。⁴⁸ 然而，由於皇民化、戰爭空襲與都市開發等因素，產生如石暘睢所說的，記載了許多統治事跡與民間事情的志書與古碑，在 1940 年代，志書都還存在著，古碑卻散佚甚至湮滅。⁴⁹ 戰後古碑調查行動的背景因此以被盟軍轟炸、炸毀者不少的背景下開展，並且也有了許多新的發現。其中被轟炸而毀壞著如「重建龍神廟增建更衣亭碑記」，也有被當作石材賣出而碑文被磨掉，而被新尋獲者，如「重修樂安橋碑記碑記」本為常福宮邊的墊腳石，發現後被遷至第二碑林。⁵⁰

這些古碑的採集，以南門碑林為例，石暘睢及其同儕留下的內容，包括碑名、時代、尺寸、地點，以及說明。以臺灣縣儒學田碑為例，除了名稱，還有 7.75×2.55 尺的尺寸，乾隆二十八年玖月日立，以及採集地開山町法院官舍敷地內，並說此地為臺灣縣儒學址。⁵¹ 對照於這些石碑多是因為都市計畫而遭遇變動的背景而採集，可推測調查者所留下的訊息，具有為一地如何在變動的時代中，留其不同時間脈絡下，該地歷史變遷的紀錄。換言之，他們留下的訊息，提供了古碑所處之地前後歷史縱深的可能線索，是種可推測地方歷史層疊發展的素材，提供了追索從當代回溯日治、清領等階段，臺南歷史變遷的重要線索。

此外，類似因為受到社會背景因素而開展收藏行動者，尚有石砣。石砣往昔為商業行為所不可或缺之物，但在金屬製作衡器登場後，砣變成無用之物，故而隨意棄置。⁵² 以至於 1930 年，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的展覽會中，公砣被誤認為「武秀才之奇勇石」，還刊列在《臺灣史料集成》一書，此事也在石暘

⁴⁸ 朱鋒（莊松林），〈臺南近十年來的考古工作概要〉，《臺北文物》6:2（1957年10月），頁90。

⁴⁹ 石暘睢，〈臺南古碑記〉，頁46-52。

⁵⁰ 朱鋒（莊松林），〈臺南近十年來的考古工作概要〉，頁91-93。

⁵¹ 臺南市歷史館，《臺南市古碑陳列場案內》，出版項不詳。

⁵² 朱鋒（莊松林），〈臺南近十年來的考古工作概要（二）〉，頁103。

睢與莊松林等同好間「成為笑話，流傳迄今」。⁵³ 由於石硧被視為見證商業交易的物件，加之被毀被棄者眾多，遂引起好古者重視，刻意採集之。另外，對於匾的收藏，其危機據莊松林自述為日本時代「數量日益減少，查其原因，乃日人嗜好我國之匾聯，競相竊取或者購買小型者，懸掛廟堂，已示文雅並玩賞之。」⁵⁴ 因此與石暘睢致力於調查收藏，相關成果可見附錄一石暘睢的著作。

(三) 古墓挖掘與古錢的歷史解釋

石暘睢的調查對象與方法，最足以與傳統文物賞玩者之差異，表現在對明墓的挖掘。明墓所以被重視，是由於鄭成功「驅逐荷蘭，收復失土」，與戰後臺灣反攻復國宗旨遙相呼應，但清代之後，所留遺物已遭破壞，因此，明墓可說是鄭成功時代的唯一遺物，是「民族精神的光輝無比的標幟」⁵⁵ 石暘睢則說「先民墳墓之存失，蓋有幸有不幸也。幸存而有碑可考者，當以明代墳墓為最古。」明墓因此成為了解早期臺灣史的重要材料。⁵⁶

然而，日治與戰後初期的臺灣，開挖墳墓若無公共利益或家族基於民俗而私為之外，定然是不見容於法律與道德的行為，如同日治時期時而可見的盜墓者到女墳竊取陪葬首飾金器之事。⁵⁷ 因此對石暘睢而言，如何在此風俗中，取得墓葬文物，成為研究的材料，便要特別注意。一般來說，具有歷史考古意義的古墓挖掘，多半是因都市計畫或為土地增產而清塚時由相關緣故者，例如親屬親為，或者是親族或者寺廟有意識進行，有時於挖掘過程中，便有學人的加入。⁵⁸ 石暘睢曾跟黃典權說明探挖李茂春墓的狀況，石暘睢說李茂春墓因為興建

⁵³ 朱鋒（莊松林），〈臺南近十年來的考古工作概要（二）〉，頁 102。

⁵⁴ 朱鋒（莊松林），〈臺南近十年來的考古工作概要（三）〉，《臺北文物》6:4（1958年6月），頁 53。

⁵⁵ 朱鋒（莊松林），〈臺南近十年來的考古工作概要〉，頁 96。

⁵⁶ 石暘睢，〈臺灣明墓考〉，《臺南文化》3:1（1953年6月），頁 25-27。

⁵⁷ 〈掘墓賊自供約四十處〉，《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11月20日，夕刊4版。

⁵⁸ 朱鋒（莊松林），〈臺南近十年來的考古工作概要〉，頁 99。

中的機場，迫近墓地，恐其遭毀，乃於某日晨約工匠張麟司前往收其遺骸。遺骨置於木盒，墓碑運送入市，並說挖掘過程得一橢圓古硯及永曆通寶若干。⁵⁹

莊松林回憶起此事，也說他與國分直一、石暘睢合作發掘明李茂春墓，又同年 10 月莊松林和董祐峰合作發掘明洪夫人墓，於是對明墓的內部構造與遺物，始有初步的瞭解。他們的合作「數年來對於新史料採集，合作無間，已有可觀的收穫，差堪告慰宿願。」⁶⁰ 到了 1955 年，根據《臺南文化》的歷史館專號之紀錄，臺南市歷史館的收藏中，已有十項左右的明墓文物。

然而，有趣的是，墓葬文物也挑戰著當時的民俗，或者忌諱者應該也不少。1954 年 11 月的「南嘉雲地區歷史文物展覽會」，相關的古墳展品共有品數 8、件數 32，位在展示書畫、古文書、古墳（墓碑拓片、墳塋照片）的第二室中，「比較不會引起一般觀眾的興趣，但文化界人士則多留連於此」。⁶¹ 或許因為墓碑拓片、墳塋照片，為風俗上之禁忌，因此較少人關注。

石暘睢的文物調查行動，最終之成果可見於《臺南文化》4 卷 2 期「文物專號」與 4 卷 4 期「歷史館專號」等兩冊中。這些成果據黃典權表示「說本期資料係採訪工作之成果，本會委員兼採訪組組長石暘睢先生之力獨多，……說明資料大半由所供給，而選件編排，亦與編者始終共之。」⁶² 文物專號中是以：匾、像、金、石、木、書、畫等為主，蒐羅了各類的公私收藏。而在歷史館專號中，文物被分為：甲、建築。乙、圖像。丙、陶瓷。丁、石刻。戊、木刻。己、文書。庚、輿服。辛、貨幣。壬、兵器。癸、其他。書籍部分從略。內容盡以歷史館所藏文物為主。要將繁瑣的文物進行有法則的分類，自始至終都是博物館工作者的一大挑戰，筆者沒有足夠的證據，說明這套分類觀的反映何種的歷史想像，但以古錢為例，較之 1930 年代《臺灣史料集成》中，古錢被放在雜部，歷史館專號中，則將貨幣獨出一類，可以見得至少這個分類架構，

⁵⁹ 黃典權，〈夢蝶園主李茂春〉，《臺南文化》創刊號（1951 年 10 月），頁 57。

⁶⁰ 莊松林，〈懷念石暘睢先生〉，頁 44。

⁶¹ 南史，〈文獻紀盛〉，《臺南文化》4:3（1955 年 4 月），頁 64。

⁶² 未著撰者，〈編後記〉，《臺南文化》4:2（1954 年 11 月），頁 132。

具有了比較清楚的社會經濟意識。

石暘睢的調查蒐藏活動不僅為保存文物，他也發展出一套文物的歷史研究方法。莊松林曾指出，臺南市兩位鄉土史家，一為連橫，另一位為石暘睢，連橫以文獻為主，石暘睢除了文書之外，著重直接史料—遺跡、遺物等考定史事，莊松林指為「當然比較詳實可靠」。⁶³ 石暘睢對於文物的調查研究，確實在方法上，也得出些心得，對於進行文物的歷史解釋一事，他曾以古錢為例，向吳樹指出：

古錢最易保存，真偽的鑑定也不困難。秦漢時代距今雖以千年計，傳世古錢仍然如新，埋於地下的出土品，也比其它的出土品較為完整。至於殉葬品的色澤義有其不同之處，廢墟或古木的發掘，如有古錢出現，對於遺跡遺物的年代之考據有莫大的幫助。……古錢的字跡有皇帝的御筆，有當代名書家的親筆，質料也不一，有青銅、赤銅、合金等。錢型的大小、鑄造的粗細、發行多少，可以看出那個朝代的盛衰及社會經濟良窳。⁶⁴

因此，石暘睢從早期的古錢收藏，進到明墓研究階段，再到兩者交相引證，可從出土古錢「看出那個朝代的盛衰及社會經濟良窳」。可見已從文物收藏者進展為可對文物進行歷史解釋的研究者。

由上述可知，石暘睢的調查蒐藏行動，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在皇民化運動、美軍空襲、都市發展，甚至度量衡工具改變等商業運作環境改變下，產生了對肖像、神像與遺牌、古碑、石碇等文物的調查與收藏，如果說「博物館蒐藏是種價值判斷，它涉及了評價人文行動，是一種受到某種意識形態操縱的結果」。那麼筆者必須指出，終戰前後的文化政策與戰爭局勢，甚或整體都市發展所構成的環境，讓石暘睢於此危機感中，展開了調查行動。

⁶³ 莊松林，〈懷念石暘睢先生〉，頁 42。

⁶⁴ 吳樹，〈紀念石暘睢先生〉，《南瀛文獻》10（1965年6月），頁 29。

事實上，石暘睢確實曾經歷辛苦收藏而毀於盟軍空襲的事。當然，石暘睢的調查行動之所以有其空間，除了其職務之外，應該也與《民俗臺灣》發行時代的整體文化環境有關，因此他也必須在其著作中，宣稱他的工作在何種意義上呼應統治者政策。至於石暘睢的調查蒐藏行動，標示了石碑發現地之當下與過去的線索，得以瞭解所處之地前後的歷史，成為重建地方史的重要素材。並由明墓調查與古錢研究為例，說明石暘睢之所以重視文物為史料，係有一套對於文物的歷史解釋與研究方法為基礎。

四、以地方歷史文化為核心的展覽

以上述調查蒐藏行動為基礎，在臺南市歷史館工作的石暘睢，其所參與策辦的展覽，再現的是種什麼樣的歷史想像？李威宜的研究指出 1960 到 1980 年代，臺南市歷史館被從「臺南歷史服務的市民博物館，轉換成為鄭成功歷史服務的民族文物館。……原本博物館中具備臺南社會史意義的圖像物件本身，被用來奉獻給民族英雄鄭成功造神運動的證物象徵。」⁶⁵ 此時，也約當是石暘睢退休之時，而在回顧 1945 到 1960 年的這段時間，他更指出石暘睢等人「在戰後十年間的蒐藏工作與詮釋，是一個不可忽略的科學行動。」⁶⁶

1946 年 5 月 1 日，歷史館重新開館，兩個月之後，辦理民族英雄鄭成功展覽會。1948 年 10 月，國民黨南市黨部籌備臺南市歷史展覽，石暘睢協助整理史料。兩次的展覽，似是為大規模的調查暖身，此後臺南市文獻會成立，並出版《臺南文化》。1954 年《臺南文化》4 卷 2 期「文物專刊」的出版，編輯群感受到文物跟文字史料的刊物同樣重要。因此在 4 卷 3 期增加「文物存真」。

⁶⁵ 李威宜，〈博物館想像的社會史研究：1960-1980 臺灣小型博物館製作者與展示物的視覺想像與歷史敘事〉，頁 81。

⁶⁶ 李威宜，〈蒐藏的科學與政治：從博物館誌的多重書寫解讀臺灣戰後獨裁形成過程與科學的權力運作〉，收於王嵩山主編，《博物館蒐藏的文化與科學》（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2010），頁 51。

4 卷 4 期的「歷史館專號」為文物存真專欄的擴大，編者們認為也許會提高市民對鄉土歷史的認識。⁶⁷

1954 年 11 月 25 到 28 日的「南嘉雲地區歷史文物展覽會」，會場被擠滿，並不寬敞的會場，第一天便有五、六千人，甚至把圍繞著展品的欄杆給弄壞了。對於類似的展覽活動，石暘睢等的想法為何？莊松林說「我們（石暘睢）將塑像列入展覽，是有兩個用意：一是要將肖像的史料價值俾使各界認識，二是作為拋磚引石之用，果然在會中，引起各方的重視，會後也有獲到如期的收穫。」在塑像的調查上，展覽後能得李勝興夫妻像、鄭氏始祖像等，都是由展覽中所得到的回饋與線索發展而成。⁶⁸ 換言之，石暘睢與同時代以著書寫作為主的同好最為不同之處，是因其負責歷史館工作，而他確實也意識到歷史館在推介歷史文化知識上的功能，清楚了解展覽與社會對話的關係。

至於展覽表現出什麼樣的歷史觀，以至於讓李威宜認為「博物館中具備臺南社會史意義」，或許可從前文盛況空前的「南嘉雲地區歷史文物展覽會」得知，這項展覽一共展出圖書、文書、碑、匾聯、書畫、雕刻、圖像、服飾、器物、古墳、其他、參考品等。展場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室擺放文廟文物及其他大型器物，第二室多屬書畫、古文書、古墳（墓碑拓片、墳塋照片），第三室為服飾、圖像與參考品。⁶⁹

在此展覽中，大陸文物被列為參考品，而沒有放入展示脈絡，或者開頭的位置。《臺南文化》中自陳「有些是漢唐宋明之遺，那雖然與開闢臺灣無何直接的關係，但在今天見物懷舊，最足以觸發反攻復國的思想。」換句話說，對於他們而言，這種宣稱將大陸文物放在一種極具解釋空間的「懷想」上，也將大陸文物放在一個與「雲嘉南文物」沒有關連脈絡的關係中，對於這項「地區歷史文物展」而言，展覽是經由其自陳具有濃厚鄉土味，藉以發揚民族精神之功能。⁷⁰

⁶⁷ 未著撰者，〈編者的話〉，《臺南文化》4:4（1955年6月），頁126。

⁶⁸ 朱鋒（莊松林），〈臺南近十年來的考古工作概要（二）〉，頁113。

⁶⁹ 《雲嘉南地區歷史文物展覽會目錄》，出版項不詳。

⁷⁰ 南史，〈文獻紀盛〉，《臺南文化》，頁64。

類似的論調，如同《臺南文化》有時也會用些透過籠統但能呼應當局的口號，例如展覽中強調「發揚民族精神」、「可以看出在臺灣血脈相承的中華文化，雖經強暴的宰割蹂躪……」或在幾乎每期的發刊詞中，也不忘強調「沉淪異種宰割五十年，然民族性岷岷長存……」。⁷¹ 但從史料文物調查到展覽歸納的過程中，展覽聯繫了鄉土、地區、地方歷史雖然搖相呼應民族精神，但並沒有被去地方、中央集權的國家化等概念取代。因此，筆者可以指出，類似由石暘睢及其同時代學人所規劃的展覽，是以地方歷史文化為核心，與其地方性的歷史館之定位一致。

五、戰後初期（1945-1960）的臺灣博物館——代結論

石暘睢及其同時代的文史調查事業之再評估，應可成為臺灣博物館史或臺灣史學史討論的課題。晚近的本土論述中，指出臺灣史研究於學院的蓬勃發展，孕生於臺灣社會民主化與本土化的背景，藉此批判 1980 年代以前，政治社會因素對於臺灣研究的打擊。強調被壓迫的歷程，可提供晚近三十年臺灣文史研究存在的正當性基礎。然而，必須了解如此的論述策略，必然關注或者強調戰後去日本化與中國化的文化政策對於臺灣研究的影響，但穿梭於其中，如石暘睢及其同時代的人文工作者們，就顯然容易被遺忘。

橫跨日治時期與戰後初期，如同石暘睢、莊松林、吳新榮、陳春木等臺南地區的文史調查研究者的文史調查及其展示活動，顯然受惠於日治時期與戰後初期的歷史學、考古學、古生物學與地質學等知識，例如接受金關丈夫、方豪等人在研究方法上的指導，但他們關心的對象，及其所立基的位置，自始至終都具有顯著的地方文化視野。

對此問題的討論，李威宜指出從 1945 年到 1971 年期間，透過「日本殖民博物館的接收轉型」和「中國博物館的移入再生」等兩條博物館軌跡，探討國

⁷¹ 南史，〈文獻紀盛〉，《臺南文化》，頁 64。

民政府如何透過博物館的空間體制建構國族的邊界、內涵以及內部的國族階序與外部的國際認同，並透過文物招喚「被殖民的臺灣民眾」與「戰爭移入的流亡社群」。他並以臺東鄉土館的例子，說明戰後初期曾為臺東民眾教育館、臺灣省立臺東圖書館，最後在 1949 年將民族學收藏轉給臺灣省立博物館。⁷² 因此指出：

整體來說，陳儀政府對於日本殖民時代所建立的中小型博物館，凡是不涉及國族意識型態的博物館，依其功能被整合在各自的專業機構，而涉及國族意識型態的博物館，則逐漸瓦解或轉型朝向中國化的方向，地方博物館則因涉及地方想像與地方認同，逐步被收編轉為其他功能或被消極擱置。真正維持博物館功能機構而且繼續投入人力與經費的，只有臺灣總督府博物館這一所綜合博物館。⁷³

李威宜也指出從地方博物館的角度，以及聚焦在戰後初期脈絡中，進行更為細緻的分析，看見臺南市歷史館、石暘睢等人，李威指出這段時間，石暘睢及其同好的工作，讓殖民知識系譜在臺南市立歷史館再現，他們的成就對照於此後的發展，可稱為「曇花一現的地方蒐藏處置」。⁷⁴ 本文寫作的目的，可說是以此為基礎，企圖透過石暘睢及其同好為例，說明其中更為細節的脈絡。

石氏推動的調查行動與被稱為歷史文物展等展示活動，企圖構建以臺南為主的地方歷史想像。如前文所述，石暘睢的調查行動與蒐藏對象，固然是因主觀的興趣因素所推動，但出於各種不同的客觀因素：皇民化運動、都市計畫、甚或文物買賣，促令造成文物的公共化危機而開展，這些因素直接或間接造成的結果，看見了一個以臺南為主的地方歷史的構成，特別是戰後初期的十餘年間，這項工作的在地化途徑，以及文物所標示的地方資訊（如石碑），顯示對

⁷² 李威宜，〈去殖民與冷戰初期臺灣博物館建制的國族想像(1945-1971)〉，頁 370。

⁷³ 李威宜，〈去殖民與冷戰初期臺灣博物館建制的國族想像(1945-1971)〉，頁 370。

⁷⁴ 李威宜，〈蒐藏的科學與政治：從博物館誌的多重書寫解讀臺灣戰後獨裁形成過程與科學的權力運作〉，頁 51。

在地歷史探掘的態度，使其所經歷的風景，並非故國河山的視野，筆者也不認為可以殖民知識系譜的再現來定位。然而，恰好也是這條路，說明戰後初期臺灣博物館發展歷程——在殖民現代性與大中國史觀之外。

除此之外，1960年代起臺灣大大小小的博物館走上同一條路，國家機器開始透過文化的集權化，建立其文化霸權，鞏固統治的正當性。但我們或許也應當思考，如果我們跟著石暘睢世代所開拓的這條路向前走，他們的調查成果及其蒐藏觀念與對象，甚或對文物的調查與詮釋，放在臺灣知識的生產歷程，及其與文化政治、社會實踐之間，究竟有何關係呢？

或許我們來讀一則小故事，以為問題之解答。1960年，石暘睢退休之際，正逢顯宮派與土城派對鄭成功登陸地點問題爭議時，也是臺南市歷史館改為民族文物館之際，此後一段時間的文物館，如黃天橫指出：

本館管理員聘任選舉功臣擔當之，缺乏保存文物的常識逢歷將近百年的劉銘傳木質楹聯改刷時，楹聯下方用刀彫刻「民國 XX 年重修」字句，〈現已埋漆不能看到此蹟了〉，試想以一個管理員身分，公家為保存文物以公家費用修整文物時，竟敢將自己之姓名刻留在文物上，這種大膽無智妄為愚蠢作法，不但徒留給後人充笑柄而已。⁷⁵

這個故事，點出當時代對於歷史或歷史文物的保存倫理與歷史詮釋，如何被大加塗抹、肆意改造的情況，如同當時代黨國為鞏固國家認同，進行的各種以民族英雄為名的歷史改造，大中國認同的價值已成唯一主流。對照於此，石暘睢世代對於文史資源保存，有著更為尊重歷史材料的認知，且不斷強調材料與臺南聯結的在地性特色。

石暘睢世代留下來的文化資產，至今依舊安躺在鄭成功文物館，並沒有多少人注意到它們對於重新理解臺南歷史的價值。然而，晚近三十年來，我們不

⁷⁵ 黃天橫，〈「臺南市民族文物館」簡介〉，頁 138。

斷強調由民主實踐乃至凝聚國民國家的過程中，多元且具主體性的地方之種種——當然包括了地方歷史，是重要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此便讓筆者想起，這批七、八十年前調查採集，且又可追溯到清代歷史的地方資料，或許正應該重新被解讀，成為臺南在地歷史的重要資源，並擴延為如同它們被採集時，那般的社會行動，招喚出這批歷史資料在歷史解釋與當代對話的多重價值。

附錄一 石暘睢著作目錄

出版時間	篇名	期刊名稱	卷數	期數
1941年7月17日	臺南に於ける 寺廟の調度品	民俗臺灣	1	1
1941年12月20日	古都臺南の街名考	文藝臺灣	3	3
1942年3月5日	臺南古碑記	民俗臺灣	2	3
1942年5月15日	臺南の石敢當	民俗臺灣	2	5
1942年6月5日	臺南古碑記補遺	民俗臺灣	2	6
1943年1月5日	家藏臺灣關係古文書 目錄	民俗臺灣	3	1
1943年4月	臺南大媽祖廟に就て	科學の臺灣	18	4
1943年4月5日	臺南郊外塚地考	民俗臺灣	3	4
1944年3月1日	臺南孔子廟禮樂器考	民俗臺灣	4	3
1945年1月1日	安平を語る	民俗臺灣	5	1
1945年未刊	帶孝	民俗臺灣	5	2
1946年仲秋月	重建朝興宮碑記稿	南瀛文獻	10	
1949年3月15日	古都碑錄(一)	公論報「臺灣風土」		41
1949年4月11日	古都碑錄(二)	公論報「臺灣風土」		45
1949年6月7日	古都碑錄(三)	公論報「臺灣風土」		53
1949年孟秋月	重興關帝廳碑記稿	南瀛文獻	10	
1951年10月24日	臺南市街小志	臺南文化	1	1
1951年12月1日	臺南文廟的樂章	臺灣風物	1	1
1952年1月20日	臺南延平王祠聯集	臺南文化	2	1

1952年2月1日	臺南武廟的樂章	臺灣風物	2	2
1952年4月24日	威震中外之劉璈	臺南文化	2	2
1952年7月10日	臺南文昌祠的樂章	臺灣風物	2	4
1952年9月24日	臺南歌謠三首	臺南文化	2	3
1953年1月31日	臺灣道署考	臺南文化	2	4
1953年3月15日	明鄭營盤考	南瀛文獻	1	1
1953年6月30日	臺灣明墓考	臺南文化	3	1
1953年9月20日	蓬壺書院與沈受謙	南瀛文獻	1	2
1953年9月30日	先師聖像流臺郡考	臺南文化	3	2
1953年11月30日	安平的石匾聯	臺南文化	3	3
1953年12月30日	清代旌表「孝友」毛士釗與其遺作	南瀛文獻	1	3.4
1954年	臺灣的金石	現代國民基本叢書	43	刊
1954年4月30日	西區拾遺	臺南文化	3	4
1954年9月20日	北區匾聯	臺南文化	4	1
1955年4月15日	大天后宮的匾聯	臺南文化	4	3
1955年6月	臺灣歷史人物印存	文史薈刊		第一輯
1955年6月25日	南縣古碑零拾(一)	南瀛文獻	2	3.4
1955年12月25日	南縣古碑零拾(二)	南瀛文獻	3	1.2
1956年2月29日	孔子廟之匾	臺南文化	5	1
1956年6月30日	南縣古碑零拾(三)	南瀛文獻	3	3.4
1956年7月31日	臺南市中東南三區匾聯	臺南文化	5	2
1956年12月31日	南縣古碑零拾(四)	南瀛文獻	4	上
1957年5月25日	臺南縣古碑志	南瀛文獻		
1958年6月20日	南縣古碑零拾補遺	南瀛文獻	4	下
1961年4月29日	南明錢錄	臺灣風物	11	4
1962年9月25日	穎之退耕錄	臺南文化	7	3
不詳	臺灣歲時記	臺灣時報	不詳	不詳

資料出處：莊松林，〈石暘睢先生遺作目錄〉，《南瀛文獻》，10卷（1965.6），頁50-53。

引用書目

《聯合報》

〈阿三哥和破草鞋〉，1977年8月22日，9版。

《臺南新報》

〈夜夜荒損田烟之目前大石馬與被部落民盜去之銀首級〉，1933年11月15日，8版。

《臺灣日日新報》

〈臺南史料館開館 附寄不少內容漸充〉，1931年6月19日，5版。

〈掘墓賊 自供約四十處〉，1932年11月20日，夕刊4版。

〈臺南市臺灣史料 籌建臺灣歷史館〉，1935年12月3日，12版。

不著撰人

1935 《臺灣歷史館出品目錄》。出版項不詳。

1963 〈序〉，《臺南文化》7(4): 1。

1954 〈編後記〉，《臺南文化》4(2): 132。

1955 〈編者的話〉，《臺南文化》4(3): 126。

1955 〈編後記〉，《臺南文化》4(4): 116。

1955 〈丁·石刻〉，《臺南文化》(歷史館專號)4(4): 92-101。

王嵩山

2013 《博物館蒐藏學 探索物、秩序與意義的新思維》。臺北：原點出版。

石暘睢

1941 〈臺南に於ける寺廟の調度品〉，《民俗臺灣》1(1): 26-31。

1942 〈臺南古碑記〉，《民俗臺灣》2(3): 46-52。

1953 〈臺灣明墓考〉，《臺南文化》3(1): 25-27。

1954 〈先高祖芝圃公行跡〉，《臺南文化》3(4): 38-39。

1961 〈南明錢錄〉，《臺灣風物》11(4): 46-47。

1962 〈穎之退耕錄〉，《臺南文化》7(3): 80-82。

朱鋒 (莊松林)

1957 〈臺南近十年來的考古工作概要〉，《臺北文物》6(2): 89-104。

1958 〈臺南近十年來的考古工作概要（二）〉，《臺北文物》6(3): 101-114。

1958 〈臺南近十年來的考古工作概要（三）〉，《臺北文物》6(4): 52-74。

李威宜

2005 〈去殖民與冷戰初期臺灣博物館建制的國族想像(1945-1971)〉，收於王嵩山主編，《博物館、知識建構與現代性》，頁 367-390。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2009 〈博物館想像的社會史研究：1960-1980 臺灣小型博物館製作者與展示物的視覺想像與歷史敘事〉，收於王嵩山主編，《製作博物館》，頁 59-96。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2010 〈蒐藏的科學與政治：從博物館誌的多重書寫解讀臺灣戰後獨裁形成過程與科學的權力運作〉，收於王嵩山主編，《博物館蒐藏的文化與科學》，頁 49-68。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吳密察

2008 〈《民俗臺灣》發刊的時代背景及其性質〉，收於吳密察策畫，石婉舜、柳書琴、許佩賢編，《帝國裡的「地方文化」 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狀況》，頁 49-82。臺北：播種者。

吳新榮

1965 〈跋〉，《南瀛文獻》10: 57-58。

吳樹

1965 〈紀念石暘睢先生〉，《南瀛文獻》10: 28-29。

林鶴亭

1965 〈石暘睢先生事蹟〉，《南瀛文獻》10: 35-36。

南史

1955 〈文獻紀盛〉，《臺南文化》4(3): 62-69。

莊松林

1965 〈懷念石暘睢先生〉，《南瀛文獻》10: 41-45。

黃天橫

1977 〈「臺南市民族文物館」簡介〉，《臺南文化》新 4: 134-138。

黃典權

1951 〈夢蝶園主李茂春〉，《臺南文化》創刊號：56-57。

黃琪惠

2006 〈再現與改造歷史—1935 年博覽會中的「台灣歷史畫」〉，《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0: 109-149。

廖漢臣

1965 〈學界的墊腳石—憶石暘睢兄〉，《南瀛文獻》10: 13-15。

蔡和泉

1965 〈緬懷故友石暘睢先生〉，《南瀛文獻》10: 55-56。

陳其南

2010 《臺博物語 臺博館早期臺灣殖民現代性記憶》。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

張隆志

2006 〈從「舊慣」到「民俗」日本近代知識生產與殖民地臺灣的文化政治〉，《臺灣文學研究集刊》2: 33-58。

臺南市歷史館

時間不詳 《臺南市歷史館案內》，出版項不詳。

時間不詳 《臺南市古碑陳列場案內》，出版項不詳。

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

1931 《臺灣史料集成》。臺南：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

臺灣歷史館

時間不詳 《臺灣歷史館出品目錄》，出版項不詳。

戴文鋒

1999 〈日治晚期的民俗議題與臺灣民俗學——以《民俗臺灣》為分析場域〉。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鍾淑敏、詹素娟、張隆志合著

2010 《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劉宜旻

2014 〈史料與歷史文化的新展示 1930 年台灣文化三百年祭史料展覽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Shi Yang Sui (1898-1964) – Also on Museums of Taiwan in the Post-World War II Period

Shih-yuan Hsieh

ABSTRACT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50s, Shi Yang Sui carried out comprehensive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s in Tainan, preserving thousands of cultural assets, leaving important clues to understanding local history. He attempted to build the local history of Tainan by looking into its long and storied history, and to communicate with society through museums and exhibitions. His professional works preserved a vast amount of historical objects and documents with rich information about the culture and history of Tainan through different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egemonies such as the Japanization movement and post-war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key enabling future generations to rebuild the history of Tainan.

Keywords: Museum History, Collection, Tainan, Cultural Heritage